

第一章

泛观博览 止心圣学

(成化八年至弘治十八年, 1472—1505)

王阳明, 名守仁, 字伯安, 自号阳明山人。明宪宗成化八年九月三十日(1472年10月31日)出生于浙江余姚。据说他的母亲郑氏妊娠十四月方始分娩, 而在阳明诞生的当天, 他的祖母岑氏曾梦见“神人衣绯玉云中鼓吹, 送儿授岑, 岑警寤, 已闻儿啼”, 所以他的祖父便为他取名为“云”, 他出生的那座楼房则被称为“瑞云楼”。^①

按照钱德洪(字洪甫, 号绪山, 1496—1574)等编撰的《阳明年谱》的记载, 阳明的先祖为晋光禄大夫王览(字玄通, 205—278), 本为琅琊(今属山东)人, 至王览的曾孙王羲之(字逸少, 321—379)始徙居山阴(今浙江绍兴); 至二十三世迪功郎王寿, 则自达溪迁于余姚, 遂为余姚人。^②姚江王氏是显赫的文化世家, 其祖上代有才人, 门庭荣耀。阳明的曾祖父王杰(字世杰, 号槐里子), “自为童子即有志圣贤之学, 年十四, 尽通四书、五经及宋诸大儒之说”^③, 其为人则“仪观玉立, 秀目修髯, 望之以为神人。无贤愚戚疏, 皆知敬而爱之, 言行一以古圣贤为法。”^④曾著有《易说》《春秋说》及《周礼考证》, 又有《槐里杂稿》数卷, 然皆不传。其祖父王伦(字天叙, 号竹轩, ?—1490), 天性爱竹, 于所居之轩, 皆环植以竹, 日啸咏其间, “视纷华势利, 泊如也”, 学者因称其为“竹轩先生”。“于书无所不读, 而尤好观《仪礼》《左氏传》、司马迁《史》。雅善鼓琴, 每风月清朗, 则焚香操弄数曲, 弄罢, 复歌以诗词, 而使子弟和之。识者谓其胸次洒落, 方之陶靖节、林和靖, 无不及焉。”^⑤其父王华(字德辉, 号实庵, 晚号海日翁, 因尝读书龙泉山中, 学者又称龙山先生, 1446—1522), 在阳明十岁的那一年, 即成化十七年(1481), 王华登进士第一甲第一名, 官至南京吏部尚书。王华为人耿介磊落, 学问深醇, 因得罪于刘瑾而被强令致仕。他退居于乡, 虽无富贵荣华, 却仍甘之如饴。深知其道德文章者当时传曰:

先生(王华)气质醇厚, 平生无矫言饰行, 仁恕坦直, 不立边幅。与人无众寡大小, 待之如一。谈笑言议, 由衷而发, 广庭之论, 入对妻孥, 曾无两语。人有片善, 称之不容口。有急难来控者, 惻然若身陷于沟井, 忘己拯救之, 虽以此招谤取嫌, 亦不恤。然于人有过恶, 亦直言规切, 不肯少回曲, 以是往往反遭嫉忌, 然人亦知其实心无他, 则亦无有深之者。先生才识宏达, 无所不可,

^① 《年谱一》, 《全集》卷三三, 第1346页。

^② 按:《阳明年谱》及《世德纪》均以王羲之为阳明世系的始祖, 然此说受到现今学术界的质疑。《世德纪》称阳明的曾祖父王杰“其先世尝植三槐于门, 自号槐里子, 学者因称曰槐里先生, 始祖为晋右将军羲之。”(戚澜:《槐里先生传》, 《全集》卷三八, 第1383页)说明阳明的先世是曾“植三槐于门”的“三槐堂”王氏。余姚诸焕灿经考证认为, “三槐堂”实为王羲之的伯父王导(字茂弘, 276—339)的二十三世孙王祐(924—987)的堂号, 属于王氏“乌衣大房”世系, 与王羲之没有关系(见诸焕灿:《姚江王氏、迁居绍兴、争嗣爵位三考》, 余姚市乡贤研究会编:《余姚乡贤论》第二辑, 1992年;钱明主编:《阳明学新探》,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2年)。钱明《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年)亦采此说。诸焕灿进一步考证认为, 王阳明为“乌衣世系”的第四十二世孙。由于“乌衣大房”系至宋代又归属于“三槐堂”系, 其后裔迁居余姚, 所以王阳明又为“姚江秘图山派王氏”的第十世孙。“‘姚江秘图山派王氏’并非经由山阴迁居余姚, 而是直接经由余杭仙宅界迁至上虞, 再由上虞达溪虹桥迁至余姚城内县衙后面的秘图山旁。……由此看来, 王阳明一系的先祖从未曾到山阴居住过。”(诸焕灿:《为王阳明寻根》, 钱明、叶树望主编:《王阳明的世界》, 第156—172页,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8年)

^③ 戚澜:《槐里先生传》, 《全集》卷三八, 第1528页。

^④ 戚澜:《槐里先生传》, 《全集》卷三八, 第1529页。

^⑤ 魏瀚:《竹轩先生传》, 《全集》卷三八, 第1530页。

而操持坚的，屹不可动。百务纷沓，应之沛然，未尝见其有难处之事。至临危疑振荡，众多披靡惶恐，而先生毅然卓立，然未尝以此自表见，故人之知者罕矣。为诗文皆信笔立就，不事雕刻，但取词达而止。所著有《龙山稿》《垣南草堂稿》《礼经大义》诸书，《杂录》《进讲余抄》等稿，共四十六卷。^①

阳明所生活的这一家庭背景，对其少年与青年时代的品德素质与学术素质的涵养，无疑是有重要影响的，而在重视宗法的中国古代社会，其宗族的显赫与家族的荣耀，盖亦容易经其主观认同而对其思想行为产生现实的影响。

按照《年谱》的记载，阳明少时独具心慧，闻祖父诵书，即能默记，但至五岁时还不会说话。“一日与群儿嬉，有神僧过之，曰：‘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竹轩公悟，更今名，即能言。”由此可知，阳明五岁前名“云”，至五岁时由其祖父改名为“守仁”。^②而大概在此后不久，阳明的父亲王华因思念山阴山水佳丽，且原为其先祖所居之地，因此又从余姚迁居到了绍兴，居越城之光相坊。^③

少年阳明聪慧颖悟，天真独秀，在其祖、父的关爱之下，自幼即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成化十七年（1481），王华状元及第，授翰林院编修；次年迎竹轩翁奉养于京师，阳明遂与祖父同行，是年十一岁。《年谱》载：

翁过金山寺，与客酒酣，拟赋诗，未成。先生从旁赋曰：“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客大惊异，复命赋蔽月山房诗，先生随口应曰：“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有人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④

这一少年赋诗的事件，不仅可见阳明的才思敏捷，而且其诗境所表达的独特理趣，以及那种潇洒意态与高远宏阔的气象，则几乎在某种意义上预示了其日后的思想学术成就。

阳明的少年时期，大概是既充满灵气而又颇有些顽皮放浪的，既心胸豪迈而又颇有些落拓不羁的。其十二岁始就塾师，大概亦不能完全像有些儿童那样循规蹈矩，所以《年谱》称其“豪迈不羁，龙山公常怀忧，惟竹轩公知之。”^⑤同样是在十二岁这一年，阳明最早接触到了道教的内容^⑥，自此“每对书辄

^① 陆深：《海日先生行状》，《全集》卷三八，第1550页。

^② 按：改名的原因是因阳明五岁不言，而神僧所谓“可惜道破”，盖有二意：一则阳明因其祖母梦神人“衣绯玉云中鼓吹”而降诞，则为非常人，然所谓“天机不可泄漏”，而取其名为“云”，复名其楼为“瑞云”，是“天机泄漏”矣，故谓“道破”；二则“云”与“云”同音，故改“云”即能“云”。至于“守仁”之义，则有取于《论语》“刚毅木讷近仁”，以及“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之意。

^③ 《年谱》未确载王华于何时徙居绍兴。陈来据有关资料进行考证，认为阳明十一岁（成化十八年，1482）以前“居余姚自无可疑”。“《年谱》又云阳明十七岁时自京至江西娶亲，次年冬返乡余姚，再次年阳明祖父死，王华归余姚守丧，这期间王华不可能迁居。至服除弘治癸丑，阳明已二十二岁。弘治九年丙辰阳明会试不第，‘归余姚结诗社’，时二十五岁。此后我们就没有材料证明阳明仍居余姚了。而正是丙辰这一年，钱德洪生于王家原居的瑞云楼，何以如此，是否此年王家迁越，无由得知。”又谓“阳明二十七岁时其家即已迁至山阴城”（陈来：《王阳明与阳明洞——王阳明越城活动考》，《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555—55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又阳明第十六世孙王诗棠先生云：“到成化十七年（1481），海日公举家徙居越城，我姚江王氏守字辈传人遂始分居余姚、山阴两地。”（王诗棠：《王阳明世系及遗存在绍兴》，《阳明学新探》，第214页）然诸焕灿则考证认为：王阳明一家“举家迁居绍兴山阴，乃在受封‘新建伯’之后。而迁居的具体日期，当在‘伯府第’竣工之后，即嘉靖元年，王阳明五十一岁之年。”“所谓正德十六年、王阳明五十岁之前，王氏一家已迁居绍兴的推断不能成立。”（诸焕灿：《为王阳明寻根》，《王阳明的世界》，第170—171页）今按：王阳明一家何时徙居绍兴的问题，由于钱德洪所编《年谱》本身的语焉不详，似乎已成“悬疑”。不过我们应当特别予以注意的是，徙居绍兴的主角不是王阳明，而是王华，原是因“龙山公常思山阴山水佳丽，又为先世故居”，所以“自姚徙越城之光相坊居之”（《年谱一》，《全集》卷三三，第1345页）。正因徙居绍兴的“主角”是王华，所以把嘉靖元年“伯府第竣工之后”作为王阳明一家迁居绍兴的时间，显然是有问题的。《年谱》“成化十七年”下注明“先生十岁，皆在越”，这似乎已经表明在成化十七年以前，王华就已经徙居山阴，其迁居的时间或当在成化十二年至十七年之间。至于其初居山阴的情况，按照王诗棠先生的推测，“有可能如同余姚住莫姓寿山堂‘瑞云楼’一样，系僦租而居之”（《阳明学新探》，第219页），这一推测应当是较为合理的。一种可能的情况是，王华在成化十七年前后迁居绍兴，未必属于举家迁徙，更未改籍，所以其籍贯仍为余姚。又王华虽徙越城，然其兄王荣、其弟王袞仍居余姚，阳明夫人诸氏亦余姚人，因此阳明的青年时代乃多往来于余姚与山阴两地之间。

^④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第1346页。按：阳明虽五岁方始能言，然至少八岁即能诗。束景南《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修订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载有王阳明八岁诗作《资圣寺杏花楼》及九岁诗作《寓资圣僧房》《棋落水诗》，其语句或清雅，或豪迈，或诙谐，颇见神韵。资圣寺在浙江海盐。据束景南考证，在成化十二年至十六年间，王华尝受聘往德清、海盐任子弟师，遂携阳明前往，使得同时受教。正因有此因缘，阳明得以寓居于资圣寺，而自然深受佛教熏陶，此又可证阳明自谓“吾亦自幼笃志二氏，自谓既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传习录上》，《全集》卷一，第42页），并非泛泛而谈，而为其少年生活之实录。

^⑤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第1346页。

静坐凝思”，并有了“读书学圣贤”的愿望。《年谱》载：

尝问塾师曰：“何为第一等事？”塾师曰：“惟读书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龙山公闻之，笑曰：“汝欲做圣贤耶？”^①

对十二岁的王阳明来说，未必真能深领“圣贤”之意，但他既把“读书学圣贤”确立为人生“第一等事”，则表明他对自己的未来生命已然有了一个明确的期盼，圣人的境界成为他生命追求的目标。为自己生命的未来状态自觉地建立起预期目的，是即为“立志”。心之所在谓之志，志之所在，行必随之。事实表明，此后阳明的生活道路虽充满艰难险阻，可谓荆棘满地，但正是这一早年即确立起来的圣人志向，成为他克服种种艰险的内在原动力。

成化二十二年（1486），阳明十五岁，仍居京师。这一年的重要事件是他对北部边关的山川形势及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因此而有了经济世务的宏大志向。“先生出游居庸三关，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询诸夷种落，悉闻备御策；逐胡儿骑射，胡人不敢犯。经月始返。”^②时畿内有“盗起”，关中亦有流民“作乱”，阳明遂屡次欲上书朝廷以献备御之策，因被王华所斥，乃止。虽然如此，这一事件仍然充分体现了少年阳明的豪迈性格，其“经略四方之志”并未因龙山公的呵斥而消泯，其后尝苦心孤诣，研习兵法，则无疑可视为其经略四方、经济世务之志的进一步体现。

大概是在次年，也即是他十六岁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对他后来的思想转变有着重要潜在影响的事件。《年谱》载：

先生始侍龙山公于京师，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亦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圣贤有分，乃随世就辞章之学。^③

这一“格竹子”遇疾的事件，阳明晚年仍有清晰的记忆，尝与门人云：

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这里意思，却要说与诸公知道。^④

由此可知，这一“格竹子”而失败的经验，在阳明的思想当中是留下深刻烙印的。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我

^① 《年谱一》：“一日与同学生走长安街，遇一相士，异之曰：‘吾为尔相，后须忆吾言：须拂领，其时入圣境；须至上丹台，其时结圣胎；须至下丹田，其时圣果圆。’先生感其言，自后每对书辄静坐凝思。”（《全集》卷三三，第1346页）按阳明一生与佛、道结缘甚深，就今存史料而言，长安街上遇相士并为之占，则是他与道教的最早接触。此时萌生“圣贤”之思，则或许与道士之占有某种联系。十八岁时于南昌铁柱宫再度亲聆道士养生之说，则对道教养生之术尝勤事不辍。对道教养生之术的兴趣，从朦胧的感觉到用心钻研，阳明一直保持到了三十岁前后。在阳明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佛、道二教皆有重要的助缘作用。

^②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第1346—1347页。按：阳明十二岁立志“做圣贤”，切不可视之为少年泛泛之说，而实为其必为圣人之心志的自觉建立，并为其此后全部生活实践行为之所据依。刘宗周说：“阳明先生自立志后，群少复来戏游，先生曰：‘吾己为圣人徒矣，岂从子辈游？’群少自此退去，而先生行始卓。”（刘宗周：《人谱杂记二》，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66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正可见阳明既经“立志”便即将其心志付之于行动的实践精神。

^③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第1347页。

^④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第1348—1349页。按：《年谱》将“格竹”事系于阳明二十一岁，误。陈来云：“我曾提出，《年谱》将格竹事记于弘治壬子（1492年）阳明二十一岁时必定有误。盖为《年谱》肯定此事发生于‘侍龙山公于京师’时，但又证明本年壬子阳明‘在越’，两相牴牾，而据海日翁墓铭、行状，庚戌（1490年）初，海日翁闻竹轩讣，即日南奔归越，至癸丑（1493年）服满，迁右春坊右论德。故1490—1493年阳明正当随父居姚守丧，决不可能在此期间发生京师格竹的事情。”（陈来：《王阳明语录佚文与王阳明晚年思想》，《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613页）此说甚为精审。陈来引《阳明先生遗言录》：“某十五六时，便有志圣人之道，但于宋儒格致之说若无所入，一向姑放下了，一日寓书斋，对数筮竹，要去格他理之所以然。……”（《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613页）可确证“格竹”之事确应发生在十五六岁时。

^⑤ 王阳明：《传习录下》，《全集》卷三，第136页。

们或许可以说，少年阳明并未真切领会朱子的格物之说，“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实际上是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误解，但同时我们又须指出，少年时代的王阳明确就是这般“天真”地去理解“格物”的，并且正是这一亲身实践的失败，终究导致他对朱子之说的隔膜之感，因此这一“格竹子”事件，在某种意义上与程度上也标志为王阳明对朱熹学说发生怀疑的开端。

“格竹子”而“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或许正是出于这一原因，阳明遂又暂时放下了“圣贤之学”，而开始转向对于道教的兴趣，明显的证据是在十八岁那一年（弘治二年，1489），他居然因与道士谈养生而耽误了自己的婚礼。是年七月，阳明从山阴往南昌迎娶夫人诸氏，《年谱》载：

外舅诸公养和为江西布政司参议，先生就官署委禽。合卺之日，偶闲行入铁柱宫，遇道士跌坐一榻，即而叩之，因闻养生之说，遂相与对坐忘归。诸公（养和）遣人追之，次早始还。^①

在此后的约半年时间里，阳明即寓居于江西，其间尝苦练书法，因深得其髓，而对“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有初步体悟。同年十二月，阳明偕夫人诸氏由江西归余姚，途经广信（治在今上饶），拜访了当时的著名学者娄谅，娄谅为讲宋儒格物致知之学，以为圣人必可学而至，阳明遂深契于心，故《年谱》谓“是年先生始慕圣学”。^②或许正因对圣学的向慕，阳明在此后的数年当中，遂转入了刻苦的广泛阅读，白天与诸从弟习举子之业，“夜则搜取诸经子史读之，多至夜分”，由是而不仅学问大进，且气质亦随之转移，“先生接人故和易善谑，一日悔之，遂端坐省言”，谓“昔者放逸，今知过矣！”^③

弘治五年（1492），阳明二十一岁，举浙江乡试。中举以后，遂仍往京师居住，盖既为侍奉其父王华，亦为准备明年的会试。第二年（弘治六年，1493）春天，阳明会试不第。据说当时的宰相、文坛领袖李东阳（字宾之，号西涯，湖南茶陵人，1447—1516）尝对阳明戏曰：“汝今岁不第，来科必为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阳明下笔立就，为诸老叹为“天才”，但亦因此而引起其嫉忌之心，以为“此子取上第，目中无我辈矣”。三年以后，即弘治九年（1496），阳明再次参加会试，“果为忌者所抑”。^④两次会试不第，虽然阳明当时的表现是非常洒脱的，尝安慰其他落第者，以为“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但若谓对其思想上毫无打击，恐亦不是事实。他落第以后，旋即归余姚，结诗社于龙泉山寺，纵情于山水清幽，驰骋于歌诗文辞，大概亦是他排遣心中郁闷的一种方式。在此期间，他还与当时的文坛巨子李梦阳、何景明、边贡、徐祯卿以及顾璘、乔宇等学为古诗文，争以才名相驰骋。^⑤但

^①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第1347页。按：阳明的岳父诸让（字养和，号介庵，1439—1495），据《姚江诸氏宗谱》卷二载：“诸让，字养和，号介庵，明成化戊子（1468）科举人，乙未（1475）科进士，历任南京吏部文选司主事、本司员外郎、本司郎中、江西布政使司左参议、山东布政使司左参政，诰授中大夫。配张氏，诰封淑人。子缩、弦、緝、经，长女适新建伯王守仁。……著有《归省录》《肥遁斋稿》《留园集》《济美集》。”（本条资料由余姚诸焕灿先生提供，特此致谢）按弘治八年（1495）诸让卒，时阳明寓居于北京太学，闻讣而“苏而复蹶”，“痛绝关山，中心若刺”，撰《祭外舅介庵先生文》，其中有云：“公为吏部，主考京师，来视我父，我方儿嬉。公曰尔子，我女妻之。公不我鄙，识我于儿。服公之德，感公之私。”可知诸让许配其女于阳明，是在诸让官南京吏部而主考京师之时，盖在成化十八年（1482）。束景南曰：“此乃指成化十八年事，阳明在京方十一岁，诸养和已指其为婿。”（《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第33页）祭文又曰：“弘治己酉，公参江西，书来召我，我父曰咨，尔舅有命，尔则敢迟？甫毕姻好，重艰外罹，公与我父，相继以归。”则可证阳明于南昌与诸氏结婚，乃在弘治二年己酉（1489），阳明十八岁。钱德洪所撰阳明年谱系之于弘治元年戊申十七岁，有误。阳明《祭外舅介庵先生文》，见《全集》卷三二，第1336—1338页。上引个别文字据《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校正。

^②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第1348页。娄谅（1422—1491），字克贞，号一斋，上饶人。少有志于圣贤之学，曾师事吴与弼（字子傅，号康斋，江西崇仁人，1391—1469）。景泰四年（1453）举于乡。天顺（1457—1464）末，选为成都儒学训导。不久告归，闭门著书，成《目录》四十卷、《三礼订讹》四十卷等。其学以收放心为居敬之门，以何思何虑、勿忘勿助为居敬要旨。然当时胡居仁（字叔心，号敬斋，江西余干人，1434—1484）颇讥其近于陆象山之学，后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江西泰和人，1465—1547）也以为其近于禅学。见《明史》卷二八三《娄谅传》。黄宗羲云：“文成（阳明）年十七（当作十八），亲迎过（广）信，从先生（娄谅）问学，深相契也。则姚江之学，先生（娄谅）为发端也。”（《崇仁学案》，《明儒学案》卷二，《黄宗羲全集》第七册，第38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

^③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第1348页。

^④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第1349页。

^⑤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全集》卷三八，第1555—1556页。按：李梦阳（字献吉，号空同子，河南庆阳人，1472—1529）、何景明（字仲默，号大复，河南信阳人，1483—1521）、边贡（字庭实，号华泉，山东历城人，1476—1532）、徐祯卿（字昌谷，苏州人，1479—1511）四人，才名相埒，主张相近，当时文坛号为“四杰”。因其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主张复古，反对绮靡，所以在文学史上将他们与康海（字德涵，号对山，陕西武功人，1475—1540）、王九思（字敬夫，号溪陂，陕西户县人，生卒年不详）、王廷相（字子衡，河南仪封人，1474—1544）合称为“前七子”，“四杰”则为其中坚。顾璘（1476—1545）字华玉，号东桥，苏州人。弘治九年（1496）进士，授广平知县，仕至南京刑部尚书。少负才名，工诗文，著有《浮湘稿》《山中集》等，合为《顾华玉集》四十五卷。顾璘尝与王阳明论学。乔宇，

是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弘治十年（1497），阳明仍寓居京师，“当时边报甚急，朝廷推举将才，莫不遑遽。先生念武举之设，仅得骑射搏击之士，而不能收韬略统驭之才，于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正是在“边报甚急”的客观形势之下，阳明开始了对兵法的钻研，其目的则在养成“韬略统驭之才”，以安靖边事。而他研究兵法，亦并非仅仅停留于阅读，而是将它转化为一种“实践”：“每遇宴，尝聚果核列阵势为戏”。^① 尽管列果核布阵只是一种桌面上的“游戏”，但其日后辉煌的军事功绩，却奠基于此。

弘治九年第二次会试落第之后，阳明也就离开了太学。^② 此后直到弘治十二年前后，则是阳明一生中所学最博而又思想上最为彷徨的时期。在这前后四五年当中，他驰骋于文章，究心于兵法，出入于老、释，思想往往游移于儒、释、道之间，虽其所事益博，却究竟未有抵止之所。虽欲用世以经略四方，却因遭忌而进士不第，使他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虽泛滥于辞章而文艺益精，却又自觉文辞毕竟不能通达于至道；虽欲为晦翁之说以成就圣人，但先前“格物”的教训仍记忆犹新。他曾怀疑少年时“格竹子”之所以失败，或许是由于未遵照朱熹循序渐进的教导，于是又谨遵其教，循序以进，再次将“格物”付诸实践，结果却总是觉得“物理”与“吾心”不能合一，无法达到朱熹所说的那种“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浑然交融境地。他因此而郁郁不乐，遂又致旧疾发作。正因有此种生活中与思想上的挫折，在弘治十一年（1498），阳明心中原先所保持的那种对于道教的兴趣遂再次转浓，并开始对道教养生之术进行深入实践，以至有“遗世入山之意”。《年谱》云：

先生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师友于天下又不数遇，心持惶惑。一日，读晦翁《上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乃悔前日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宜无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渐渍洽浹，然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也。沉郁既久，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分。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③

按照这一叙述，阳明再次转入道教并有“遗世入山之意”，与他对朱熹格物致知之说进行再次实践而又遭到失败并致“旧疾复作”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我们同样可知，无论是从事于朱熹之学还是为道教之术，阳明的目的均在于“通至道”以成为圣人，因此他思想上的一切苦闷与彷徨，其根源亦均在于未能找到一条真正能够通达于圣人之至道的途径。

弘治十二年（1499）春，阳明第三次参加会试，“举南宫第二人，赐二甲进士出身第七人”^④，朝廷命观政工部。同年秋天，他奉命督造威宁伯王越的坟墓。^⑤ 这一原本为无足轻重的公务，却成了阳明

字希大，号白岩，山西乐平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授礼部主事，嘉靖初官吏部尚书，后因议大礼不合，去位。为人雅好山水，与李东阳等交游，诗文隽拔，工书法，卒于嘉靖十年（1531），春秋六十有八。《明史》卷一九四有传。

^①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第1349页。按：阳明研究兵法，主要在弘治九年落第之后到弘治十二年第三次会试得第前后的数年之间。据有关史料，王阳明有兵法方面的著作多种，如《武经七书评》《阳明兵策》《兵志》《历朝武机捷录》等，可见其用功之勤。有关作品的辑录及考证，可参见《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

^② 从弘治五年至九年，王阳明实际上是在北京太学度过的。阳明《答储柴墟二》提到：“往时仆与王寅之、刘景素同游太学”（《全集》卷二一，第896页），《程守夫墓碑》则提到其父王华与程守夫之父为同年进士，故有通家之谊，而其自己与程守夫则于“弘治壬子，又同举于乡，已而又同卒业于北雍，密迹居者四年有余”（《全集》卷二五，第1039页）。弘治壬子即弘治五年（1492），其居四年有余，则当至弘治九年。阳明撰于弘治八年的《祭外舅介庵先生文》，自称“寓金台甥王守仁”，可证其时仍居于北京。故束景南云：“‘金台’指北京，盖其时阳明方在北雍求学，……是阳明弘治五年至九年在太学读书，年谱失载，此文乃得一证”（《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第33页），是也。

^③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第1349—1350页。按：阳明自十八岁在南昌与铁柱宫道士“谈养生”之后，史料多次记载阳明修炼道教养生术。钱德洪在这里的记载虽太过简略，但把“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系于“旧疾复作”之后，仍然值得玩味，说明阳明之所以修炼道教养生术，是与他的身体疾病直接有关的。束景南所辑阳明《口诀》诗：“闲观物态皆生意，静悟天机入穹冥。道在险夷随地乐，心忘鱼鸟自流行。”系之于弘治九年（1496），并详加考证，说明王阳明与当时“尹真人”的关系。所引彭轸（字子殷，浙江海盐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官南京刑部主事）《冲溪先生集》卷十八《尹山人传》，其中提到：“王文成公守仁试礼闈卷落，卒业南雍（束按：应为北雍），走从尹游，共寝处百余日。尹喜曰：‘尔大聪明，第本贵公子，筋骨脆，难学我。我所以入道者，危苦坚耐，世人总不堪也。尔无长生分，其竟以勋业显哉！’文成怅然愧之。”（《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第40页）此“尹山人”或“尹真人”，人称“尹蓬头”，为全真派道士。束景南以为阳明与“尹蓬头”学道百余日，当在弘治十年（同上书第42页），又说：“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云：‘弘治十一年，是年先生谈养生……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此所谓谈养生‘道士’，似即指尹山人。盖弘治九年至十一年之间，阳明每年往返于余姚、京师之间，皆经南都，可见尹上人，谈道论仙。”（同上书第43页）束景南此说，可资参考。

^④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第1350页。

^⑤ 王越（1425—1497），字世昌，河南浚县人。景泰二年（1451）进士。因西部军功，成化十六年（1480）封威宁伯，世袭一千二百石。《明史》卷一七一有传。

对其军事知识进行实践的机会：“驭役夫以什伍法，休食以时，暇即驱演八阵图。”^① 他是以军事管理的方法来完成这一民事工程的。这一点已经表明，阳明有超越常人的知识转化能力。驭役夫以军士之法，演列八阵之图，与原先的“聚果核列阵势”相比，无疑要更为生动真切，因此它实际上成为阳明对其“韬略统御之才”的一次演练，是其少年时代即深植于心灵的“经略四方之志”的进一步显扬，故“识者已知其有远志”。^② 时有“彗星之变”，又有“虏寇猖獗”，朝廷“命将出师”，边务再急。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阳明遂上疏条陈边务，表达了他对时务的关切，亦进一步表达了他的“远志”。

按照阳明的观点，边事紧急，外患日滋，其根源却在于内政不修，权臣为奸；故边陲之患，正为天心仁爱的表现，正是朝廷改弦更张而还归政治清明的契机。其论云：

臣愚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忧世者，谓之迂狂；进言者，日以浮躁；沮抑正大刚直之气，而养成怯懦因循之风。故其衰耗颓塌，将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觉。今幸上天仁爱，适有边陲之患，是忧虑警省，易轶改辙之机也。

其陈言边疆“军情之利害，事机之得失”，以为当厉行八事：

一曰蓄材以备急，二曰舍短以用长，三曰简师以省费，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严守以乘弊。^③

我们没有证据表明当时朝廷采纳了阳明的这些主张，但《陈言边务疏》体现了阳明对当时政治的基本见解，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他对自己研习兵法之心得的集中表达，而其中的一些基本思想，则为其本人未来的军事活动所实践。

弘治十三年（1500）六月，阳明为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次年八月，奉命前往直隶、淮安等府，会同各地巡按、御史审决重囚，平反了不少冤狱。^④ 在此期间，阳明公务繁剧，又兼深夜苦读，积劳成疾，因得咯血之疾。黄绾撰《阳明先生行状》记载：

授刑部主事，差往淮甸审囚，多所平反，复命。日事案牒，夜归，必燃灯读五经及先秦、两汉书，为文字益工。龙山公恐过劳成疾，禁家人不许置灯书室。俟龙山公寝，复燃，必至夜分，因得呕血疾。^⑤

不过按照阳明的自述，其患“虚弱咳嗽之疾”乃在弘治十四年三月，亦即在被差往直隶、淮安审决重囚之前。当时剂灸交攻，药石并用，至入秋稍愈，“遽欲身去药石，医师不可，以为病根既植，当复萌芽，勉强服饮，颇亦臻效。及奉命南行，渐益平复，遂以为无复他虑，竟废医言，捐弃药饵。冲冒风寒，恬无顾忌，内耗外侵，旧患仍作。及事竣北上，行至扬州，转增烦热，迁徙三月，尪羸日甚”。^⑥ 由此可知，阳明被差往淮安等府审决囚犯，原是带病之躯，而案牒繁劳，乃致旧疾转深，及至事竣北上，疾病尤甚，转增烦热。这一身体上的疾患，实为导致阳明当时在思想上发生再次转折而与道教有更深接触的直接原因。正由于咳嗽之疾转趋深入，竟成咯血，因此在弘治十五年八月，阳明上疏朝廷，请求归家乡养病，得到朝廷的允许。在归山阴的途中，他游览了楚地以及九华山等名胜，作《九华山赋》，宿无相、化城诸寺，访仙寻道，探赜佛源，颇有些出世的遐思，谓“逝予将遗世而独立，采石芝于层霄；虽长处于穷僻，乃永离乎隘器”，“吾其鞭风霆而骑日月，被九霞之翠袍；抟鹏翼于北溟，钓三山之巨鳌”，“长遨游于碧落，共太虚而逍遥”。^⑦ 此虽为“游仙”的传统主题，未可究实，但仍可视为当时阳明思想的

^①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第1350页。

^②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全集》卷三八，第1556页。

^③ 王阳明：《陈言边务疏》，《全集》卷九，第316—317页。

^④ 这里的时间据阳明《乞养病疏》，《全集》卷九，第322—323页。《年谱一》谓“先生录囚多所平反”（《全集》卷三三，第1350页）。

^⑤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全集》卷三八，第1556页。

^⑥ 王阳明：《乞养病疏》，《全集》卷九，第322页。按：阳明作品中多次提到“旧疾”，这一“虚咳”乃至咳血的病症，实伴随他的一生。虽谓弘治十四年（阳明三十岁）三月患病，但从阳明行履的有关记载来看，我很怀疑十六岁时因“七日格竹”而“劳思致疾”，实际上即已种下病根。

^⑦ 王阳明：《九华山赋》，《全集》卷一九，第729页。按：《年谱》系阳明游九华山于弘治十四年下，然《全集》卷一九有《归越诗三十五首》，注明“弘治壬戌年以刑部主事告病归越并楚游作”，无相、化城诸寺之作均收入其中，又同卷《九

真实反映，因为他归山阴以后，旋即筑室于阳明洞，行导引之术，并且达到了相当精深的造诣。《年谱》云：

告病归越，筑室阳明洞中，行导引术。久之，遂先知。一日坐洞中，友人王思舆等四人来访，方出五云门，先生即命仆迎之，且历语其来迹。仆遇诸途，与语，良合，众惊异，以为得道。^①

这同一事件，黄绾记云：

养病归越，辟阳明书院，究极仙经秘旨，静坐，为长生久视之道，久能预知。其友王思裕等四人欲访公，方出五云门，即命仆要于路，历语其故，四人惊，以为神。^②

从这些记载来看，阳明因“呕血之疾”而归越，因养病而筑室于阳明洞中，“究极仙经秘旨”，“为长生久视之道”，对道教养生之术身体力行，并且达到了相当精湛的造诣，无疑应为事实。但这一道教炼养术的成就，却反而使他再次陷入于深沉的思想矛盾之中。根据《年谱》的叙述，这一“能预知”的事件应发生于弘治十五年八月至十六年之间。在“能预知”之后不久，阳明即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但对道教炼养术进行实践的实际成就，又使他不能立即舍弃道教，故“又屏去，已而静久，思离世远去。惟祖母岑与龙山公在念，因循未决。”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知道，阳明当时的确曾有出世的念头，只是思亲之念又使他“因循未决”，其主观上是处于深刻的思想矛盾之中的。“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断灭种性矣。’明年（按：弘治十六年），遂移疾钱塘西湖，复思用世。”^③

这样看来，弘治十六年（1503）在阳明思想的整体发展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一年中，

华山赋》亦注明“壬戌”，因此我们认为，他游九华山应在归越养病的途中，《年谱》或许是误记了一年。然束景南更为详细的考证认为，阳明游九华山实有二次，一在十四年秋，一在十五年春，也就是阳明完成审决重囚北上复命的途中游览一次，得到朝廷允许归越养病途中再游览一次，或许更接近事实（见《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第123页）。这段时间，因身体疾病原因，阳明对道教养生术可谓耽着颇深，他游九华山，实也有“寻道访仙”之意。《年谱一》：“是时道者蔡蓬头善谈仙，待以客礼。请问，蔡曰：‘尚未。’有顷，屏左右，引至后亭，再拜请问，蔡曰：‘尚未。’问至再三，蔡曰：‘汝后堂、后亭礼虽隆，终不忘官相。’一笑而别。闻地藏洞有异人，坐卧松毛，不火食，历崑山险访之，正熟睡，先生坐傍抚其足。有顷，醒，惊曰：‘路险何得至此？’因论最上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后再至，其人已他移，故后有‘会心人远’之叹。”（《全集》卷三三，第1351页）束景南辑有阳明《和九柏老仙诗》一首，系之于弘治十四年，并认为“九柏老仙”者，“非此‘善谈仙’之蔡蓬头莫属”（《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第119页），如此则阳明与“蔡蓬头”乃有诗相唱和，而非“一笑而别”那么简单。

^①《年谱一》，《全集》卷三三，第1351页。按：“筑室阳明洞中”一事，在阳明的生平事迹中是一重要事件，也是其所以号“阳明子”或“阳明山人”的原因。但后世因无法在会稽山找到一个可以容人居住的岩室而产生了种种怀疑，或以为“阳明洞”不在绍兴而在余姚。清初萧山毛奇龄则诋“讲学阳明洞”为“妄极”，说：“会稽山即苗山，并无洞壑，凡禹井、禹穴、阳明洞类，只是石罅，并无托足处。旧诬以道人授书洞中，固大妄，今作传者且曰讲学阳明洞，则妄极矣。”（毛奇龄：《王文成传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87册，第2页，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下引该书简称“四库存日本”，只注册次、页码）会稽山并无可以容人居住的洞穴，这一点或许当年就已经引起了黄绾的怀疑，所以在《阳明先生行状》中不言“筑室阳明洞中”，而谓“辟阳明书院”。陈来对此曾有详细考证，证明“阳明洞”在绍兴无疑，而所谓“洞”，非必洞穴之谓，而实为“洞天”之省文，其说详审精当。下文所引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序》谓“乃筑室阳明洞天，为养生之术”，又可为一证。宋施宿等撰《会稽志》载：阳明洞天在会稽县宛委山龙瑞宫，为道教所谓三十六洞天之第十一洞天，名“极玄太女之天”（《会稽志》卷一一，四库本第486册，第225页）。龙瑞宫则在县东南二十五里。又据陈来说，“五云门”即绍兴府城之正东门（陈来：《王阳明与阳明洞——王阳明越城活动考》，《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545—559页）。关于王阳明修道道教养生术所臻造诣，王畿有更为形象的描述：“（阳明）乃始究心于老、佛之学，缘洞天精庐，日夕勤修，练习伏藏，洞悉机要，其于彼家所谓见性抱一之旨，非惟通其义，盖已得其髓矣。自谓尝于静中，内照形躯如水晶宫，忘己忘物，忘天忘地，与空虚同体，光耀神奇，恍惚变幻，似欲言而忘其所以言，乃真境界也。”（《滁阳会语》，吴震编校：《王畿集》卷二，第33页，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又按：明蒋一葵说：“王文成养痾阳明洞时，与一布衣许璋者相朝夕，取其资盗。璋上虞人，淳质苦行，潜心性命之学。尝蹶屣走岭南，访陈白沙，其友王司舆以诗送之曰：‘去岁逢黄石，今年访白沙。’璋故精于天文、地理、兵法、奇门九遁之学。文成后擒逆濠，多得其力。成功归，赠以金帛，不受。文成每乘简舆访中山，菜羹麦饭，信宿不厌。歿后，文成题其墓曰：‘处士许璋之墓’”（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九〇，第115—116页，《续修四库全书》第119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此“王司舆”，即《年谱》所谓“王思舆”、《阳明先生行状》所谓“王思裕”者无疑。而“友人王思舆等四人来访”，其中或即有许璋，也未可知也。据季本《王司舆传》，当作“司舆”为是。王司舆者，名文轅，字司舆，山阴人。季本称其“励志力行，隐居独善，乡人熏其德者，皆乐亲之。少学为古文，极类庄、列，诗逼唐人，读书不牵章句。尝曰：‘朱子注说多不得经意。’成化、弘治间，学者守成说，不敢有私议朱子者，故不见信于时。惟阳明先师与之为友，独破旧说，盖有所本云”（季本：《王司舆传》，《季彭山先生文集》（稿本）卷三，第896页，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06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据此，则阳明终究能超出朱熹的思想束缚，“独破旧说”，王司舆未必没有助成之功。

^②黄绾：《阳明先生行状》，《全集》卷三八，第1556页。据此，则所谓“阳明书院”，即阳明在会稽山中的结庐之所。

^③《年谱一》，《全集》卷三三，第1351页。

他对道教养生术的实践达到了巅峰，可谓已然得其神髓，但亦正因为如此，他又“渐悟仙、释二氏之非”，终于完成了弃仙、释之学而“复思用世”的思想转变。钱德洪云：

吾师阳明先生出，少有志于圣人之学。求之宋儒不得，穷思物理，卒遇危疾，乃筑室阳明洞天，为养生之术。静摄既久，恍若有悟，蝉脱尘全，有飘飘遐举之意焉。然即之于心，若未安也，复出而用世。^①

正因有“复思用世”的思想转变，阳明在“移疾钱塘西湖”期间，尝往来于湖山诸刹，其间竟用儒家“爱亲本性”之说“喝醒”禅僧。有一逸事：

（阳明）往来南屏、虎跑诸刹，有禅僧坐关三年，不语不视。先生喝之曰：“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终日眼睁睁看甚么！”僧惊起，即开视对语。先生问其家，对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对曰：“不能不起。”先生即指爱亲本性谕之，僧涕泣谢。明日问之，僧已去矣。^②

从这一逸事，我们大抵可以看出两点：第一，阳明对佛教，尤其是禅学实有深湛造诣，他对僧呼喝，语含机锋，正是禅家的典型风格，若不谙此道，则断不敢有如此作为；第二，他此时的心态，实已然无滞于老、释，而重新回归到了儒家为世所用以经略四方的基本立场。

正因有这一重大的思想转变，因此当弘治十七年的秋天，他病愈起复并应山东监察御史陆偁的聘请而出任山东乡试的主考官时，策问当朝礼乐之制，便即以“老、佛害道，由于圣学不明”为论了。^③考毕，成《山东乡试录》，阳明亲为之序，“人占先生经世之学”。^④同年九月，阳明改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

弘治十八年（1505），阳明三十四岁。在他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这一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其主要的代表性事件是“门人始进”，他开始授徒讲学，倡导身心之学。《年谱》载：

是年先生门人始进。学者溺于词章记诵，不复知有身心之学，先生首倡之，使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闻者渐觉兴起，有愿执贽及门者，至是专志授徒讲学。然师友之道久废，咸目以为立异好名，惟甘泉湛先生若水，时为翰林庶吉士，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⑤

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钱德洪在这里关于王阳明与湛若水“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的记载，实际上是模糊不清的，有把弘治十八年、正德元年二年内事囫圇混为一事之嫌。这一问题实际上涉及阳明

^① 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序》，《全集》卷三七，第1500页。

^②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第1351—1352页。

^③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第1351—1352页。阳明策问“佛老为天下害已非一日”，详见《山东乡试录·策五道》第二，《全集》卷二二，第948页。《山东通志》卷二七《宦绩志》：“陆偁，浙江鄞人。弘治时巡按监察御史，严正不阿，决释疑狱，尝革济宁漕闸夫役冒滥者计万人。岁大比，厘剔科场弊窦，设立条约，洪纤毕举。聘王守仁主试，名士毕收。东人称科举之盛，必推弘治甲子（十七年）云。”（四库本第549册，第619页）

^④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第1352页。按：《山东乡试录》是否为阳明手笔，有争议。钱德洪在《年谱》弘治十七秋“主考山东乡试”下谓“试录皆出先生手笔”，《全集》卷三六《年谱附录一》载嘉靖“二十九年庚戌正月，吏部主事史际建嘉义书院于溧阳，祀先生”（第1478页），又载本年有同门张峰“重刻先生《山东甲子乡试录》，复谓“《山东甲子乡试录》皆出师手笔。同门张峰判应天府，欲番刻于嘉义书院，得吾师继子正宪氏原本刻之。”（第1480页）据此，则《山东乡试录》似应出自阳明手笔。台湾钟彩钧非但认为《试录》为阳明之作，且以为“代表阳明在龙场之悟前对儒学的认识和造诣”，并对此进行了论述。见钟彩钧：《王阳明思想之进展》，第13-18页，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王阳明全集》“编者注”谓“非皆阳明之作”，或得之。我个人认为，《山东乡试录》应为士子优秀答卷的编集，其中的部分试题或策问则当出于作为主考官的王阳明之手。虽然如此，以《试录》为代表了阳明“悟仙释之非”以后关于传统儒学的基本认识，则仍然是合理的。

^⑤ 《年谱一》，《全集》卷三三，第1352页。按：湛若水（1466—1560），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增城人。弘治五年（1492）乡试中举，师事当时大儒陈献章（字公甫，号白沙，广东新会人，1428—1500）。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第二名，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这亦正是阳明之所以能够与湛若水相识的机缘。《明史·湛若水传》：“时王守仁在吏部讲学，若水与相应和”（《明史》卷二八三，第72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若水尝官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致仕后仍四处讲学不辍，凡所至，必建书院。然其后论学，则又与阳明不尽相同。本传又说：“若水初与守仁同讲学，后各立宗旨。守仁以致良知为宗，若水以随处体验天理为宗。守仁言若水之学为求之于外，若水亦谓守仁格物之说不可信者四，又曰：‘阳明与吾言心不同。阳明所谓心指方寸而言，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以吾之说为外。’一时学者遂分王、湛之学。”（《明史》卷二八三，第7267页）然学者于此说宜更加思量！阳明对甘泉之学的态度，后文当及之。

究竟于何时“归正于圣学”的问题。或许正由于《年谱》的这一记载并不清晰，模棱其词，对后人有所误导，学术界遂大多以王阳明与湛甘泉的定交作为其“归正于圣学”的标志，自古及今，几乎成为“定论”。或者至以为阳明之所以能够“归正于圣学”，乃是出于湛甘泉的引导，有的研究者或许为突出湛甘泉在阳明“归正于圣学”这一转变中的作用，甚至把弘治十八年与正德元年混为一谈。^①

在这里，我觉得甚有必要对这一问题稍加论述，以正本清源。主要澄清两个问题：

第一，王、湛定交究竟发生在哪一年？关于这一问题，我想最好还是听从当事人湛甘泉先生自己的说法。《赠别应元忠吉士叙》：

斯道丧而友义之废也久矣！自予抱此志以求于天下，天下非无爱予者，而独寡予助者也。正德丙寅，始得吾阳明王子者于京师，因以得曰仁徐子者。……王子于吾言，无所不悦……^②

《阳明先生墓志铭》：

正德丙寅，（阳明）始归正于圣贤之学，会甘泉子于京师。^③

《奠王阳明先生文》：

嗟惟往昔，岁在丙寅，与兄邂逅，会意交神。同驱大道，期以终身。^④

《潮州宗山精舍阳明王先生中离薛子配祠堂记》：

阳明子之教，良知之教也。正德丙寅，与甘泉子初定交于京师兵曹清黄，语人曰：“吾从宦三十年，未见此人。”其时共尊明道“仁者浑然天地万物一体”之学，是矣。^⑤

甘泉先生多次明确叙述他与阳明定交的时间是“正德丙寅”、“岁在丙寅”，也即是正德元年（1506）。黄绾撰《阳明先生行状》说：“甲子，聘为山东乡试考试官……明年，白沙陈先生高第甘泉湛公若水一会而定交，共明圣学。”^⑥照黄绾这里的记载，“甲子”是弘治十七年，“明年”则是指弘治十八年，“一会而定交，共明圣学”，则王、湛定交当在弘治十八年。但黄绾的这一记载，实际上正是造成后人混乱的源头之一。不过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黄绾的《阳明先生行状》是先于甘泉先生所写的《阳明先生墓志铭》的，按甘泉先生自己的叙述，其撰《阳明先生墓志铭》，是依黄绾《阳明先生行状》“发状而谨按之”来写就的，但在《阳明先生墓志铭》中，他并没有采用黄绾弘治十八年与王阳明定交的叙说，而仍明确“正德丙寅会甘泉子于京师”。显而易见，这是甘泉先生本人对黄绾之记述错误的明确纠正。既然如此，那么王、湛定交的时间就不再需要争议，是正德元年而不是弘治十八年。

第二，王阳明究竟于何时“归正于圣学”？如果我们一般地把“归正于圣学”理解为王阳明从佛、道二教的研习以及其他“杂学”之中摆脱出来，而重新回归到儒学的本位，那么基于上文的叙述，其实在弘治十六年，阳明就已经“归正于圣学”了，因为他当时的心态，已经超离于他原先曾十分倾心的佛、道二教之说，而转趋于儒学的基本立场了。如果我们对“归正于圣学”作某种特殊的理解，不仅指阳明一般地回归于儒学，而且还指他以“心学”为基本的立场取向，那么这一转折所发生的相当明确的时间应是弘治十八年（1505）夏季。阳明《书扇赠扬伯》：

扬伯慕伯阳，伯阳竟安在？大道即吾心，万古未尝改。长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缪矣三十年，于今吾始悔。

^① 如秦家懿云：“他归正圣学，实定于弘治十八年或正德元年（1505），与湛若水初遇之时。”（秦家懿：《王阳明》，第41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按：弘治十八年为1505年，正德元年则为1506年，并非同一年。

^② 湛若水：《赠别应元忠吉士叙》，董平校点：《甘泉先生文集》内篇卷六，第130—131页，《儒藏》（精华编第253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按：徐曰仁，即徐爱，阳明妹婿，是阳明最早的弟子之一。今《传习录上》部分为徐爱所录。

^③ 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全集》卷三八，第1539页。

^④ 湛若水：《奠王阳明先生文》，《全集》卷四十，第1682页。

^⑤ 《甘泉先生续编大全》第五卷，第13页，转引自黎业明：《湛若水年谱》，第3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⑥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全集》卷三八，第1556页。

诸扬伯有希仙之意，吾将进之于道也。于其归，书扇为别。阳明山人伯安识。^①

据束景南的考证，诸扬伯，名偁，嘉兴人。“阳明八岁始好佛老，此诗云‘缪矣三十年’，盖虚指也。疑诸偁弘治十八年入京赴会试（时已二十八岁），科举落第，乃来见阳明问学，阳明书扇赠别，盖在夏中也。”^②“大道即吾心，万古未尝改。长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此数句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阳明不仅从佛、道二教回转到了“圣学”，而且已经把圣学所阐明的“大道”同一于“吾心”的万古长在了。诸扬伯求仙，而阳明书扇以赠的目的是“吾将进之于道也”，更是显然以佛、道二教为“非道”的明确表态。一个人的思想演历或转变，大概不容易发生突然的转折，而更多地体现为一个逐渐的转变过程。虽然阳明自弘治十五年左右即已经意识到佛、道二教不过“簸弄精神，非道也”，但也没有立即就放弃佛、道二教之学^③，有时还表现出相当深刻的自我思想矛盾。弘治十七年主考山东乡试，在某种意义上对其思想转向有重要的助成作用。考虑到这样一些因素，我们遂可以比较肯定地把弘治十六年至弘治十八年作为阳明思想或其为学路向的转变时期。弘治十六年，既是阳明对于佛、道二教之研习在某种意义上所达到的巅峰时期，亦是他开始摆脱二教而向儒学回归的起点，到弘治十八年确认“大道即吾心”，则真正完成了回归于“圣学”的自觉转变。

因此实际上，王阳明在正德元年丙寅在京师遇到湛甘泉先生之前，当弘治十八年“门人始进”之初，就已经在倡导“身心之学”，教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了，只不过时风风靡，率被人视为“立异好名”而已。亦正因此故，他与湛甘泉先生在正德元年的相遇，便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为自己找到了思想上的同调而欣喜，并因此而进一步坚定了其必为圣人的志向。阳明后来对自己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曾有深刻的批评性反思，对他与湛甘泉的定交则给予非常积极的高度评价：

守仁幼不知学，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疾疢之余，求诸孔子、子思、孟轲之言，而恍若有见，其非守仁之能也。^④

某幼不问学，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于老、释。赖天之灵，因有所觉，始乃沿周、程之说求之，而若有得焉。顾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后兴。晚得友于甘泉湛子，而后吾之志益坚，毅然若不可遏，则予之资于甘泉多矣。^⑤

显而易见的是，正德元年与甘泉先生的定交，实际上并不是阳明终究能回归于“圣学”的原因或起点，而是当他“岌岌乎仆而后兴”之际所获得的一种极为难得的支持性力量，是当他处于精神的冷寂之中所得到的一种无限温暖与温情的抚慰。正因有甘泉先生的精神支持，心志相同，阳明的圣学之志才益为坚定，才显得“毅然若不可遏”，沛然而莫之能御，所以阳明说：“予之资于甘泉多矣。”

王阳明自少年志学，继以泛观博览，中经任侠骑射、精研兵书、驰骋于诗文、究心于佛老，回旋曲折，波澜叠兴，其所学极其“博杂”，而终究止心于圣学，完成了精神生命之主本的自觉建立，从而为主体自身的精神安顿确立了最终的归依之所。毫无疑问，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王阳明对于生命的本原性存在及其终极价值的不懈追求，而且清晰地体现了他勇于自我否定的批判精神。精神境界的转进与升华，原是在自我的否定性扬弃之中才得以实现的。而其最终的止心于圣学，则表明他终究在精神的深处为自己确立了安身立命的根基，因此代表了王阳明第一期思想发展的阶段性终结。自此他止心于圣学，归命于孔孟，意志坚定，虽历尽万苦千辛，而不复稍有移易。

关于阳明何时“归正于圣学”的问题，事实上还涉及如何对阳明此前之全部生活经历与思想经历进行评价的问题。在阳明的自我反思之中，二十年来的泛观博学被视为“陷溺于邪僻”，而其最终的回归于圣学则无异于思想生命的更生。在阳明的自我批评之中，我们的确可以体会到那种在经历了山重水复的艰难曲折之后，终于找到真理之光明的心灵喜悦。但或许正因为有阳明自己的这一自我批评的否定性评价在前，人们关于他三十四岁以前的思想与学术的一般评价，遂亦多有否定之意。

阳明亲炙弟子对阳明弘治十八年之前的思想曲折多给予相对的客观性描述，虽隐含批评，但更突出其过程的艰辛。如钱德洪说：

^① 束景南：《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第213页。按：《全集》卷十九收有本诗，题作《赠阳伯》，有错字，且无后题，故以束先生此录为准。

^② 束景南：《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第213页。诗中“缪矣三十年”，虽为“虚指”亦可，但亦可能“三”为“二”之误，阳明多自谓“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

^③ 按：束景南《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辑有阳明弘治十六年至十七年的诗文多首，其中不少仍有明显的佛、道痕迹。

^④ 王阳明：《别黄宗贤归天台序》，《全集》卷七，第260页。该序作于正德七年（1512）。

^⑤ 王阳明：《别湛甘泉序》，《全集》卷七，第257—258页。该序作于正德七年（1512）。

吾师阳明先生出，少有志于圣人之学。求之宋儒不得，**穷**思物理，**卒**遇危疾，**乃**筑室阳明洞天，为养生之术。**静**摄既久，恍若有**悟**，蝉脱尘**垒**，有飘飘**遐**举之意焉。然**即**之于心，若未安也，复出而用世。谪居**龙**场，**衡**困**拂**郁，万死一生，乃大悟“良知”之旨。^①

钱德洪又揭示阳明的“为学三变”与“为教三变”。其“为学三变”：

先生之学凡三变，其为教也亦三变。少之时，驰骋于辞章；已而出入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至道也。^②

为学“三变而至道”，其曲折艰难之意自蕴于其中，而**既**谓“三变而至道”，则自然就隐含了对于“至道”以前之所学的批评。钱德洪的这一观点，即为黄宗羲《明儒学案》谓阳明“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之所本。^③王畿论阳明为学的经历，也有“三变”之说：

先师之学，凡三变而**始**入于**悟**，再变而所得始化而**纯**。其**少**稟**英**毅**凌**迈，**超**侠不羈，于学无所不窥。**尝**泛滥于**词**章，驰骋于**孙**、**吴**，虽其志在经世，**亦**才有所**纵**也。及为**晦**翁格物穷理之学，几至于**殒**，时**苦**其**烦**且难，自叹以为若于**圣**学无缘，**乃**始究心于**老**、**佛**之学。**缘**洞天精**庐**，日夕**勤**修，**炼**习**伏**藏，洞悉机要，其于彼家所谓见性**抱**一之旨，非**惟**通其义，**盖**已得其**髓**矣。……及至居夷处困，动**忍**之余，恍然神悟……^④

钱德洪谓阳明“三变而至道”、王畿谓“三变而**始**入于**悟**”、黄宗羲谓“三变而始得其门”，虽措辞不同，所谓“三变”的实际所指亦不全然相同^⑤，但对于龙场之前的思想经历，大抵并无否定之意，而重点突出其“至道”之艰辛。然**湛**甘泉先生论阳明为学之变，则有“五**溺**”之论：

（阳明）**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始**归正于圣贤之学，会甘泉子于京师。语人曰：“守仁从宦三十年，未见此人。”甘泉子语人亦曰：“若水**泛**观于四方，未见此人。”遂相与定**交**讲学，一宗程氏“仁者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之**指**。^⑥

甘泉先生的《阳明先生墓志铭》是以**黄**绾所撰《阳明先生行状》为基础的，**黄**绾在《阳明先生行状》中说：

公（阳明）生而天资绝伦，读书过目成诵。少喜任侠，长好**词**章、仙、释，既而以**斯**道为己任，

^① 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序》，《全集》卷三七，第1500页。钱德洪在《答论年谱书》（第十）中尝再致此意，谓：“先师始学，求之宋儒不得入，因学养生，而沉酣于二氏，恍若得所入焉。至龙场，再经忧患，而始豁然大悟‘良知’之旨。”（《全集》卷三七，第1523页）然谓阳明在龙场“乃大悟良知之旨”，则似就阳明思想之核心要旨的前后一贯而言。阳明正式标揭“良知”之说，是在平宸濠之后，约当正德十五年左右。

^② 钱德洪：《刻文录叙说》，《全集》卷四一，第1746页。

^③ 黄宗羲《明儒学案·姚江学案》：“（阳明）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朱熹）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黄宗羲全集》第七册，第201页）

^④ 王畿：《滁阳会语》，《王畿集》卷二，第33页。王畿（1498—1583），字汝中，号龙溪，绍兴人。《明史·王畿传》：“弱冠举于乡，跌宕自喜。后受业王守仁，闻其言，无底滞，守仁大喜。嘉靖五年举进士，与钱德洪并不就廷对，归。守仁征思田，留畿、德洪主书院。已奔守仁丧，经纪葬事，持心丧三年。久之，与德洪同第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进郎中。给事中戚贤等荐畿，夏言斥畿伪学，夺（戚）贤职。畿乃谢病归。畿尝云：‘学当致知见性而已，应事有小过，不足累。’故在官弗免于请，以不谨斥。畿既废，益务讲学，足迹遍东南，吴、楚、闽、越皆有讲舍。年八十余不肯已。善谈说，能动人，所至听者云集。每讲，杂以禅机，亦不自讳也。学者称龙溪先生。其后士之浮诞不逞者，率自名龙溪弟子。”（《明史》卷二八三，第7274页）王畿为阳明学说的有力传播者，然其思想发展的成熟形态，则又与阳明不无同异。

^⑤ 钱德洪所谓“三变”，主要指“驰骋于辞章”、“出入于二氏”、“龙场悟道”；王畿之所谓“三变”，则指“泛滥于词章”、“驰骋于孙、吴”、“究心于老、佛之学”，至于“龙场之悟”，则为“再变而化纯”，故实有“四变”。黄宗羲所谓“三变”，指“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居夷处困而悟格物致知之旨”，实与钱德洪相同。

^⑥ 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全集》卷三八，第1538—1539页。

以圣人为必可学而至。实心改过，以去己之疵；奋不顾身，以当天下之难。^①

显而易见，甘泉的“五溺”，是在黄绾的叙述中加入了“骑射”，其他则全然一致。但黄绾只说“喜好”而已，并未用到“溺”这样较“喜好”程度更深且有明显否定之意的字眼。但或许由于甘泉的概括更加“整齐”，他关于阳明“归正于圣贤之学”以前的“五溺”之说，**历有传述**^②，至今仍影响广大，往往被研究者所援引^③，不仅用以说明其思想过程的艰难，而且更用以突出“会甘泉子于京师”之于阳明“归正于圣贤之学”的作用与意义。

在甘泉先生的叙述之中，既谓之“溺”，则显然包含着对阳明过去之所“习”的否定性评价；既谓之“归正”，则显然以其“五溺”之“习”为不正而入于“邪”。**也就是说，甘泉先生实际上是将阳明“正德丙寅始会甘泉子于京师”作为一个显著的标志性事件来叙述，并将阳明前后之所学在价值上相互对立起来的，这样就不仅十分突出了阳明“归正于圣学”的意义，而且充分强调了“会甘泉子于京师”的意义。**我们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阳明回归于“圣学”实际上是早于“正德丙寅会甘泉子于京师”的。王、湛之间的京师相会，不是促成阳明“归正于圣学”的主因。阳明既谓自己的圣学转向是“赖天之灵”，同时又因得甘泉子而“吾之志益坚，毅然若不可遏”，正是如实之说。

不过真正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会甘泉子于京师”在阳明最后的圣学转向中究竟起多大作用的问题，师友之间的切磋琢磨，共励其德而共进其学，原是古人之所以尚友、贵友的应有之义。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看待与评价阳明在弘治十八年之前的全部生活实践与思想经历。我想指出的是，如果以“五溺”来否定阳明三十四岁以前的生活与思想经历之于其未来思想形成的作用与价值，实际上是误入歧途的。我个人认为，阳明自十二岁立志做圣人，以之为人生“第一等事”，虽然中间经过任侠、骑射、文辞、老释的泛观博览**以及**多重的生活与思想经验，看似其圣人之志有所移易，而实则全然未改。所有这些都是他从不同的学术与生活维度对“圣人之道”的探索与实践，**是自由的思想“漫游”。**其最终的止心于圣学，则是由“漫游”而“定向”。有“定向”而无“漫游”，或许失之偏隘；有“漫游”而无“定向”，则必失诸泛滥而无所攸归。有“漫游”而有“定向”，则“漫游”即所以为“定向”，“定向”一经实现，则“漫游”皆为“定向”之用。起始于弘治十六年而完成于弘治十八年的圣学转向，在王阳明那里，固然为其思想发展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期，它标志着阳明思想境界的转换，是对其过去全部思想经验的超越；但与此同时，超越却并不意味着全然抛弃，而是基于批评性反思的重新诠释与意义整合而达到的一种新的思想境界。其泛观博览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全部思想成果，仍然为其未来思想发展的重要资源；其一切生活实践与知识才能的广泛积累，则为其未来生活世界的进一步拓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王畿曰：

我阳明先师崛起绝学之后，生而颖异神灵，自幼即有志于圣人之学。盖尝泛滥于辞章，驰骋于才能，渐渍于老释，已乃折衷于群儒之言，参互演绎，求之有年，而未得其要。及居夷三载，动忍增益，始超然有悟于“良知”之旨。……虽然，道一而已，学一而已。良知不由知识闻见而有，而知识闻见莫非良知之用。文辞者，道之华；才能者，道之干；虚寂者，道之原；群儒之言，道之委也，皆所谓良知之用也。^④

诚然，正是三十四岁以前思想经验上的曲折回旋，才使王阳明在实现其圣学转向之后能够独运孤明而坚信本心的真理，从而支撑起其广袤的思想世界；亦正是其三十四岁以前多方面才能的切实培育与历练，才使其本心的表达能够挥洒自如，从而支撑起其宏大的生活世界。

^①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全集》卷三八，第1580页。

^② 如刘宗周说：“阳明先生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词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始归正于圣贤之学。”（《人谱杂记二》，《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118页）此处所述，便全然与甘泉先生所说相同。

^③ 即便在日本著名阳明学研究大家冈田武彦先生那里，其晚年大著《王阳明大传》也仍沿袭“五溺”之说，并谓甘泉先生的“五溺说”“记述了王阳明年轻时的精神历程”，“王阳明年轻时善感多变，心无定性，最初沉溺于‘任侠’，后又修习弓马骑射之术和兵法，沉迷于辞章诗文，执着于道教神仙，最后却又迷上了佛学。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王阳明三十五岁，是年他转投圣贤之学，开始笃奉儒学。”（冈田武彦：《王阳明大传》，第68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年）仔细来看，冈田先生在这里的某些措词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如谓阳明年轻时“心无定性”，至正德元年始“转投圣贤之学”，则不仅阳明十二岁时以立志读书做圣人为“第一等事”为虚设，而且其三十五岁之前的生命历程在“心无定性”的观点之下也变得分裂了。

^④ 王畿：《刻阳明先生年谱序》，《全集》卷三七，第1503—1504页。